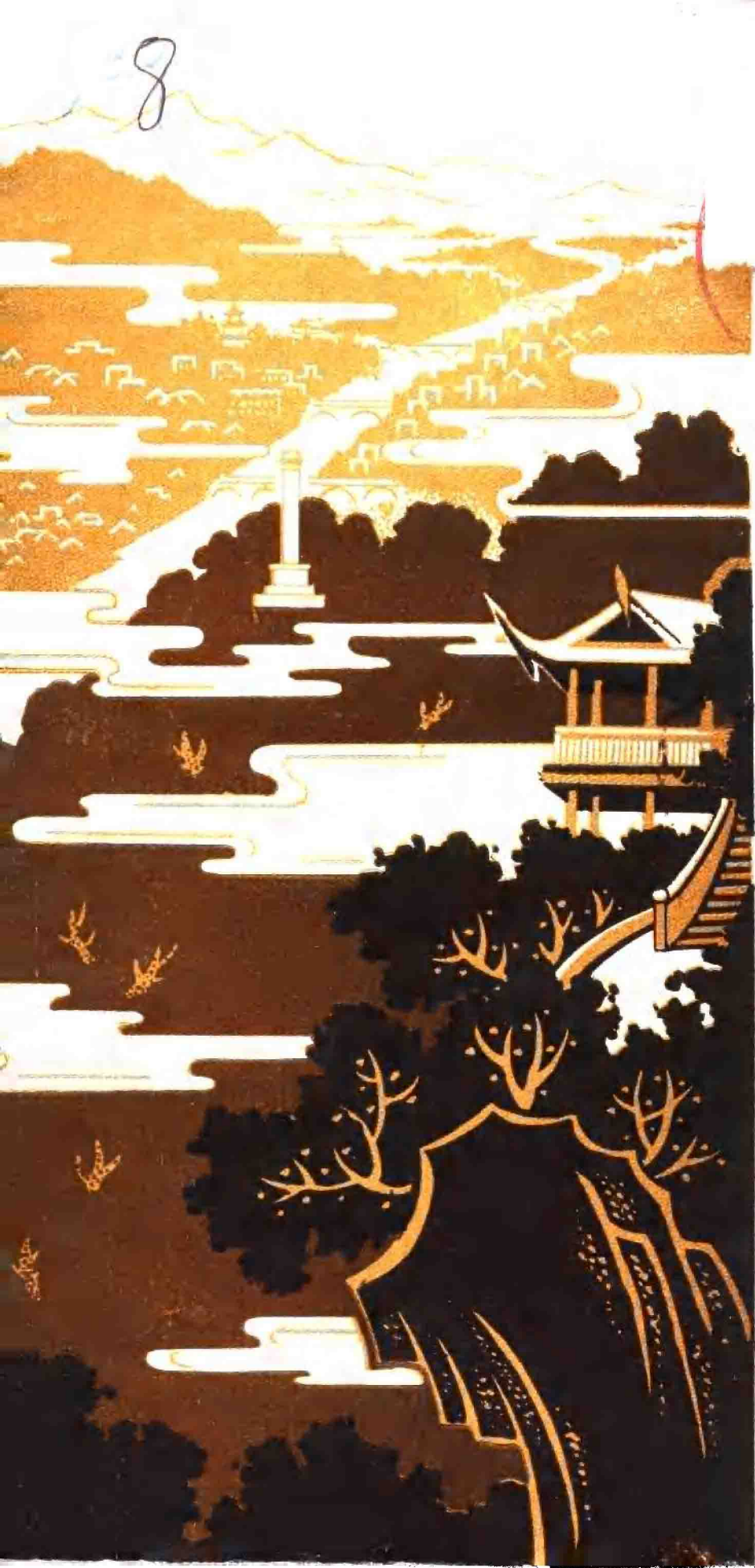




長河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长汀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室

一九八八年六月

目 录

把青春献给祖国·····	李 欣 (1)
闽西义勇军长汀挺进队政工宣传队·····	邓剑雄、董晋 (9)
南昌起义军入汀与长汀地方党的创建·····	康模生 (13)
长汀苏区中华邮政的查考·····	邱梓松、陈茂金 (16)
长汀县小学教育发展概略·····	张 涛 (18)
长汀私立兴华工职学校和县立工职学校·····	邱仁源 (22)
浅谈长汀几处古建筑结构及其艺术特色·····	肖爱莲、傅火长 (23)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的兴建经过·····	谢镇成 (28)
长汀南山宋代和明清瓷窑遗址概况·····	赖仰周、赖友生 (29)
汀籍华工陈林等的口供实录·····	胡江平 (33)
长汀历史上的几家印刷所·····	毛 星 (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汀县历届委员会简介·····	陈道先 (38)
建国后长汀县总工会的建立及其沿革·····	邱日新 (42)
民国时期长汀县商业团体(公会)概况·····	邱仁源 (46)
周副主席在长桥岬·····	穆 星 (51)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	陆定一 (53)
廖获甫先生与《长汀县志》·····	毛 星 (61)
学生时期的廖鸿英·····	廖明义 (63)
闽汀名人轶事四则·····	郭义山 (65)
罗良治政与战略战术·····	枫林、邹子彬 (68)
中唐贬汀三文人·····	林衍仁 (70)
黄慎轶闻·····	黄水基 (71)
长汀苏区民情风俗·····	枫 林 (72)
浅谈长汀民间武术·····	谢镇成 (73)
唐代“谢公楼”探讨·····	黄海冰 (74)
汀水汇灵集(长汀历代诗选)·····	邹子彬 (78)

把青春献给祖国

李 欣

福建长汀，以前叫汀州，是我的故乡。我1917年出生在这里。

我出身于一个工商业者的家庭，生活是比较富裕的，在我们长汀算是首屈一指富户。本来我父亲也是个穷人，一个穷秀才，在旧社会那种制度下，人们若想摆脱贫困，办法之一是去学习做生意，也就是经商。他开头给有钱人当帐房先生，学到了一手经营技术，慢慢地发了财。

父亲从事商业活动之余酷爱读书，我家藏书之富，被称为“甲于全县”。他于书兼收并蓄，我看到一部最早的左翼文学作品是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最早介绍苏联红军的一本书叫《劳农赤军》。

我国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样一种局面也反映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县城。长汀位于闽、粤、赣三省边区，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那个县以及附近几个县大小军阀都有。大的万把人、三、四千人，号称师长、旅长；中的五、六百人，号称团长，营长；也有那种廿来个人，十几条枪独霸一方胡传魁式人物，称不起团长、营长，就叫个团防局长。一方面有各派军阀争夺政权，媚敌卖国；另一方面有人民到处奋起反抗，这就是我国当时政治的总情况。

我参加政治生活，可以说从读小学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也是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造成的。那时我们小学生跟在中学生后面，手持各种颜色的三角小纸旗上街示威喊口号。一次我参加示威回来，父亲问我：“你们上街喊什么？”“打倒段执政！”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段执政就是当时中国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当时他是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那次上街示威，大概是由于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引起的，当时中国的独裁者段祺瑞要将山东出卖给日本，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抗议，段下令开枪，打死多人，其中就有鲁迅先生文章中写到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北平的枪声，诱发了遍及全中国的抗议示威运动。

在我上学的同时，我还看到了许多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书。拿军阀混战来说吧，我们闽西那几个县的大小军阀，他们经常火拼，今天这个打过来，明天那个打过去，他们有时在城外打，有时在城里打。不定什么时候，人们会被一阵突发的枪声从梦中惊醒。我在书上读到什么“生灵涂炭”，“肝脑涂地”之类的话，我是亲眼看到什么叫“肝脑涂地”的。那就是肚子被打穿，脑壳被打碎，内脏和脑浆淌了一地。这是没字的书，这些可都是有字的书的原型，比书本生动得多的东西。

那时我家里有一支单筒的望远镜，就象电影《甲午海战》里大家看到的同样的东西，举

起那支望远镜，从我家的楼上可以直接观察到军阀队伍敌对双方，在城南那片高地上互相厮杀的景况。

再就是土匪如毛。从我们长汀到江西瑞金，路上有很多高山，山上长满了蒿草，足有一人多深。三三两两的土匪藏在草丛里，若过来的人多，他们就一动不动；倘若过来的是单身汉，那就难免要吃上一闷棍，财物就会被劫掠一空。用书上的话来说，就叫“萑苻遍地”。

我们家乡山多地少，土地剥削率很高。因交不上租而丧失耕地的农民只好去讨饭。卖儿卖女的也很普遍。

1927年，从广东那边来了北伐军，他们系着三色领带，给群众开大会，做讲演，还演“文明戏”使人耳目一新。也有军阀队伍投机“易帜”，摇身而变为北伐军的。他们印发一种小册子叫《三民主义浅说》，这就是我读到的最初一部讨论当代中国政治的书。从那里，我对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的学说，获得了初步的知识。

在小学的课堂上，老师讲授孙中山《伦敦蒙难》，《十次起义》等故事，使我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不久，南昌起义军从江西入闽到长汀。一下子来了好几万，队伍里有贺龙、叶挺，而叶挺将军就住在我家最前面的一进房子里。起义军点了长汀一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名字，还捉了一些人，罚了一些人的款，这是我对革命的具体行动最初的认识。

1929年3月，朱毛红军由江西来到长汀附近，长岭寨一战，消灭了长汀最大的土著军阀郭凤鸣旅，并打死了郭凤鸣。在南校场召开群众大会时，郭的尸体被捆在一个梯子上竖放在讲台一边。老百姓是眼见为实，耳闻为虚的。这回亲眼看到压在他们头上的那块大石板已被掀倒，群众呼的一下就都起来了。满城的街上出现了“工农群众武装起来参加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工农苏维埃政府”等标语。成群结队的游行队伍，手持梭标，打着红旗，高呼口号行进在大街上，那景况十分热烈，就象过节一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觉到：这就是革命！

毛主席的一首词里这样写着：“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说的就是当时的历史，一页崭新的，生动的历史。

我那时在长汀中学（也叫省立七中）初中念书，同学中有的人已参加了共青团。包浩是团的小组长，根据我平日的表现，他建议吸我入团。这还是头几年一位老同志叫黄树庭的告诉我的。正在这时，父亲突然把我带到了香港（那里有父亲开的长兴行），并把我送进了一所著名的中学叫圣保罗书院。我呆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确实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因为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每天都得做早祷。我不是教徒，我为什么要下跪？真见鬼！还要学唱英文的《赞美诗》，第一句我还记得，译成中文是：“战斗，战斗，竭尽全力战斗！”我心想耶稣基督不是热爱和平吗？为什么还叫别人为他而战斗？后来学了《西洋史》，我才知道，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死的人何止千万计！

吃饭之前，要求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座位前面念上一段话：“我主天父赐给我们粮食……阿门。”粮食是农民种的，怎么会是天父赐给的呢？圣保罗书院的学生，不管你信教与否，一律另起教名。我还姓李，但名字却被换成了弗兰西斯，叫弗兰西斯·李。

那时用的全是英国人给他当时的殖民地印度编的课本，就叫做“印度课本”。我是堂堂

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念印度课本呢？难道真成了“次殖民地”不成？那时满街都是被人称之为“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

1932年1月28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抗战，打退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时人心大振，香港的中国居民大放鞭炮，几乎放了一个通宵，这件事，惹恼了英国殖民当局，命令“红头阿三”到处捉拿放鞭炮者。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庆祝中国队伍打了胜仗？！一气之下，我向父亲提出：在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要回内地上学。父亲还算开明，同意了我回广东的要求。

后来我进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它的前身，是清末的官僚，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办的两广学堂（另一个名字叫“广雅书院”），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的中国传统文化，“西学”指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这就是伦理道德还要保留封建的那一套，科学技术则采用西方的。这在甲午海战中证明是失败的。当时那些海军将领操作现代战争机器的本领全是从西方学来的，而且学得也是好的。可是政治思想仍然是封建的那一套，焉得不打败仗？

但是这种办学方针一直延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阀陈济棠统治时期。尽管他不遗余力提倡尊孔读经，但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师生的抵制。

我进这所中学时，发现这所学校很特别。学校周围被一条小河围了起来，只有一个大门能出得去，称为“锁校主义”，她还是广东省的实验中学呢！学生全部都是寄宿的，只有男生。每班约三十人，设一班主任，和学生同吃同住，批阅每个学生每天的《学习日记》。礼拜六晚上放假，可以外出，礼拜天晚上自习前必须赶回。

她有相当大的阅览室和藏书颇多的图书馆。拥有全国各种期刊。瞿秋白狱中最后遗作《多余的话》很快我就看到，那是发表在一份叫《逸经》的杂志上的。

在这种环境里，人们除了做完课堂作业外，还有充足的时间供个人支配。我这时读了很多中外左翼和进步作家的作品，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丁玲、张天翼等，这是中国的，外国的如辛克莱（美）、小林多喜二、佐藤春夫（日）、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苏）等等。

那时广东有个党领导的地下“文总”和“左联”，领导人陈黄光（后被捕牺牲），潘皮凡等人，潘是我们学校的教员。在他们的领导组织下，我们班有个“读书会”的小组，他们在暗中指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我被吸收参加，开头只有三个人，由关琬当组长，后来他去上海了，就由我当组长，除了在本班发展几个人外，别的班级的同学也有参加的。

我收获最大的一本书是华岗（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任山东大学的校长）著的《中国大革命史》，那时是部禁书，封皮进行了伪装，这本书，在当时是作者为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大革命的全过程，有事实，有分析，有总结。它把我从懂事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讲到了，它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及其前途。是评价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所以对我启发最大，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来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尽管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基本上是针对当时中国革命问题而写的一部好书。

在那个时候读马列的书是犯禁的。有一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令禁止一百多种书，我们

事前已得知，便商量将同学们的借书证都借得来，一下子把禁书单上列了名字的书从图书馆里一借而空，最后以报失赔偿了事。就这样，使这些书仍得以在暗中流通。

除了读书，我们还将学习心得写成墙报进行交流。那时我们班主任是位教化学的蔡老师，对我们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没有难为我们。广雅中学（省立一中后来的名字）里的读书会，给我打下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

1935年秋，我考进了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当时有两个目的：一是学德文，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学会了德文，可以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是德国是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学会了德文，可以更好地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入学，上的是德语速成班。主要授课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课堂测验，尽管熄灯之后仍不得不跑到厕所里——那里的灯是常明的——去温习功课。在紧张地度过了三个月之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学生为反对日寇和蒋介石共同炮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举行的示威，遭到了军警残酷的镇压之后，北平的一个同学来到同济大学找到了我，他打算把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向同济大学的同学作个介绍。怎样才能把全校同学集合起来听他做报告？我想到了校钟，只有敲打校钟才能把同学们从课堂里叫出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游泳池边，把设置在那里的校钟敲响了，我一顿猛敲，大家都从课堂里跑出来，这样，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大会。北平来的同学声泪俱下地讲述他们为什么举行这次示威，他们遭到了怎样一种对待。他讲话的主题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最打动人心的的一句话是：“华北之大，已不能平静地放下一张书桌了！”他要求上海的同学们和北平同学采取一致行动。

往后就演变成了12月24日上海大中学生的南京路大示威和赴京请愿，在这次行动中，蒋介石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从哄骗到威胁，最后竟拆除路轨，派出铁甲车将我们押送回上海。我们就仿照北平同学南下宣传的方式，组织了三个宣传团，分别到京沪线，沪杭线，苏北等地去扩大抗日宣传。

学校当局收到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提前放了寒假，在同学们都离开学校以后，通知我说：“你已被开除学籍了。”就在这期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那时组织上传阅的文件有一份红军大学的招生简章，我向组织说：让我去红大吧！领导我们支部的是团的法南区区委代表邹泽沛同志（也叫四川小陈，后病死於法租界提篮桥监狱）。他说：“白区工作本来人就不多，大家都走了，谁来坚持白区工作，再说，你如果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许有一天你会到红大当教员。”想不到他的话在我年迈时终于应验。在过了四十二年之后，我竟然来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从事教育工作。

“我就到北平去怎样？”“北平都已发动起来了，你去，就到那些没有发动起来的地方去，青岛不是很好吗？那里是我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堡垒之一，你何不到那里去工作呢？”于是我到青岛上了山东大学。

到山大后，我读的是工学院机械系，又从一年级从头读起。有一位高我一班的同学叫王冠仲（后改名徐允一，1933年在胶东被当作托派误杀），他和李昌（后来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同在同济附中加入共青团，后被学校开除，李去了北平，王来到青岛。

1935年冬，山大响应“一二·九”举行罢课时，他作为该年级的级会主席，未能抵住家庭

的压力中途脱离，群众对他有看法，所以，我没有恢复他的组织关系，而只是在工作中保持联系。

1936年8月底，北平成立了民先总队部，李昌担任了总队长。青岛方面派王冠仲前去联系，在他回来以后召开了青岛民先队成立大会，会址在青岛台西镇滋阳路四号王桂荣一所空房子内，到会的有二十来人，主要是山大同学。市女中、铁路中学、文德女中、圣功女中也都有同学参加。

山东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曾积极响应，运动爆发后的第九天，即12月18日就成立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通电全国，声援北平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独裁卖国。后来，山大学生救国会又联合礼贤中学，文德女中，市立女中等校学生在山大召开会议，成立了青岛学生联合会，形成了以山大爱国学生为核心的，包括广大中学学生在内的一支抗日救亡队伍。山大学生救国会是全国学联执委会的一个成员，青岛也就成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

1936年2月10日当青岛大港三号码头举行落成典礼，当晚在栈桥放焰火时，山大爱国学生组成宣传队，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介绍北平学生抗日爱国斗争的事迹，抨击国民党丧权辱国政策，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镇压，爱国学生奋起斗争，李声簧、陈延禧、廷荣懋、熊德邵、韩福珍、王广义等同学被捕。他们被拘留后，坚贞不屈，一再提出抗议，在山大爱国师生和全市人民的支援下，不得不释放他们。学校当局随后又以“行动逾轨、破坏校纪”为借口，开除了学生救国会六名执委的学籍，同学们义愤填膺，通过了罢课决议。3月8日黎明，五百多名军警包围了山大第四校舍，砸门破窗而入，搜索学生代表和被开除同学，当场拘捕学生三十二人，内有女生一人，激于义愤，胡家珍、黄天华、盛韵婉等六位女同学站出来说：“爱国无罪，要拘留就把我们一起拘留吧！”被拘留的同学进行绝食斗争，终于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将吴靖等同学释放，收回了开除十三名学生的成命，但李声簧、王广义等六人仍被勒令退学。

参加民先队的山大同学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进一步巩固组织，1937年春，在青岛海滨公园集会，成立了山大民先队区队部。开展了唱救亡歌曲，新文学研究，世界语学习班等活动。我从上海带来的《巴黎救国时报》，《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文件》等材料，在民先队员中暗中传阅。

这一年的夏天，在济南的辛庄进行大中学生集中军训，全部军官和军士都是由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派出的。有关韩复榘的笑话很多，但我们没有听过他讲话。派来从事训练的人员都是很干练。我是从西北军接受的入伍教育，他们完全遵循冯玉祥那套练兵方法，每天三操两讲，投弹射击，劈刺击拳，利用地形地物，野外勤务以及各种典、范、令等使劲猛灌，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是大学生，文化高，接受快。两个月时间累得不亦乐乎，加上吃粗饭，喝带泥浆的水，我的身体还算不错，也累得生病住了院。

陈振麓同志在军训期间和我在一个班。他在1933年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当过兵，又是西北军，所以，对这一套比较熟悉。由于有他这个带头兵，所以，我们班无论在内务方面，在操场动作方面都做得比较好，结业时，我们班还得了奖。两个月严格的军事生活，为我后来从事军事政治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训结束，我们接到北平民先总队部的通知去北平参加全国民先总队部的成立大会，这件事酝酿了很久。青岛组成了一个包括王冠仲、吴绪、李凤、胡家珍等人在内的代表团于7月7日由青岛乘火车去北平。火车到了天津才知道卢沟桥已打响了全面抗战的枪声，去北平的火车已经不通了。是继续前进，还是往回返？当然要继续前进！吴绪说：“火车不通可暂住我叔叔家。”第二天，车通了，我们一起到了北平。

这时，民先总队部正在日夜讨论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和当前任务，常常开会到深夜，总队部临时给了我一个任务，和北大两位同学编了几期油印小报。

7月28日，北平沦于敌手，30日，天津又告陷落。我一直挨到8月8日，才把随身带的衣物送到当铺里换了点钱，离开北平。那时大批北平学生涌向天津，打算从塘沽乘船南下。天津的旅馆住得满满荡荡，我找了十来家也没能找到投宿之地。天津那时有英、法、意、日等租界，因为战时，租界里实行宵禁，夜里在街上是不许人停留的，怎么办？我找了一位店老板商量：“你们厕所那么多，能不能改成间临时客房？我照一般客房付房费”。“就照你说的办吧！”真是谢天谢地，总算住下来了。可是为了赶早到码头去买回山东的船票，尽管累，也不能贪睡，再说，屋里气味也叫人难受。不等天明，我就出了旅店，出门走了不远，遇上了一队法国巡捕，是一帮越南人。那时，中国人在租界里是奴才的奴才，越南人成了主子，他们叫我站住，我停下来。“你跟我到警察局去！”“为什么！”“你犯了宵禁”。

“天都快亮了，我得赶到塘沽买船票”。“少废话，你给我走！”这样我就到警察局蹲了一个多小时。天亮后，我急忙赶到塘沽，好歹上了一条到烟台去的船，然后，从烟台公路乘汽车返青岛。

我从北平带回来一套游击战术教材，还有一本《国防概论》，那是讲战略问题的。我最早看到“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战术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知识分子发出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我决心要和青岛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但我是一个大学生，住在大学校园里，打游击，要到农村去，我和农村没有联系。怎样才能到农村去呢？如果，我当时冒冒失失到劳山，且不说有人会接待我，国民党的保甲长，警察局还会把我扣起来。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后来，我就真被扣押过。那时，我和周持衡同志（解放后曾任吉林省长）两人想到平度、安邱一带找到当地党的关系，走到景芝附近，就被“乡农学校”扣了一夜。周持衡同志念了鲁迅的两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以抒发当时的情感。好在我们出去活动，带了一张高密游击队开的护照，才放了我们，因此，我们得找一些合法的途径，利用合法的形式来开展工作。

当时，平津已沦于敌手，日本人迟早要向青岛进攻，这就迫使国民党也不能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国民党市党部办了一个“防空救护训练班”，贴出广告招生，我们便去报名参加，这样，我们就取得了到农村去的一个合法身份。

训练班结业后，我和几位民先队员一起到劳山毕家村，住埠落小学，往事沧桑，现在小学只剩了个墙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毕家村的李西山（李味复），了解到他原是青岛邮政局的一个小职员，1927年入党，不久被捕，在济南蹲了八年监狱。1937年释放政治犯时出狱。我把了解到的情况报告了组织，给他恢复了党的关系。后来通过他，又陆续解决了王景瑞、李明海、江明吾等人的组织关系。这几位都是老同志。王氏兄弟是兰家庄人，土生土长，和人民有血肉关系。通过和他们一道开展串连活动，就组织起一支小小的队伍，自

已取名叫劳山抗日游击队第四中队，我们中唯一当过兵，扛过枪的是陈振麓，就要他当了中队长，另一个民先队员王儒林当了指导员。1938年夏天，那时我们已转到另外一支部队，陈振麓不幸得肺结核，被送回他在济南的老家，终因病重不起，临终还高喊“起来”！1939年秋，也是在另一个部队，王儒林因吃不了苦，脱离了队伍，可能他也觉得不好，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在革命道路上有人落荒，有人动摇，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那伙民先队员走掉的，也就是这一个，其余的人都非常能吃苦，不怕牺牲，表现得很坚决，很坚定。举几个例子：

前面提到过一个女同学王桂荣，她出生于一个高级职员的家庭，由于读了很多进步书籍，而走向革命，她有个男朋友，是海军学校的学生，热恋着她，因为她要参加劳山游击队，而那位男朋友不舍得丢掉“锦绣前程”，竭力反对她去参加游击队。谈了好几次都无结果，最后，那位海军学生约她海滨公园最后摊牌。那天她那位男朋友带了一支手枪，威胁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们就死在一起！”“你这是愚蠢的犯罪行为，我坚决反对！”那位朋友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就朝着王桂荣的影子打了一枪，愤愤地走开了。这真是两条路线的生死决斗。那位海军学生后来到了台湾，大概当了什么将军了吧？但是历史无情地证明，王桂荣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当时的民先队员中有个韩宁夫同志，他是山大土木系学生，那时东北军五十一军的地下党要求我们推荐给他们一个工作人员，条件是个大个子，身强力壮，能背一付油印机外加一挺轻机枪。我们觉得韩宁夫同志最合适。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后来，这支部队在战斗中被打垮了，他回到高唐老家，当了那里的县委书记。前些年，他是湖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劳山游击队原来打算搞四、五个中队，五、六百人，后来，一缺少武器，二受到比我们强大的一支国民党游击队孙殿斌部的压力，三在李家沙沟遭到一支地主武装的偷袭，牺牲了一个游击队员肖维成。看来，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要存在下去，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时，我们有一位同志当了高密地主武装蔡晋康的副司令，另一位同志当了他的政治部主任，蔡还答应我们建立一支独立中队。叫第四中队。但是，事物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没过多久，蔡晋康部队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先是逼走了我们那位副司令，后又突然包围我第四中队，威胁要断绝我们粮食，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这支部队。

第四中队有十多位高密县的爱国青年，三十多位诸城县的爱国青年，他们中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出发前，高密县长张翰、诸城师范校长王明复、国民党复兴社员、童子军教员郭维舟等冒称家长代表，妄图劝阻，并挑拨说：“不要跟坏人走。”还指着最年轻的王培义说：“你这小鸽子能干什么？”王回答说：“抗日还分男女老少？”刘钧儒说：“你究竟代表那个人的家长？”我们的同志不顾一切威胁利诱，坚决离开了蔡部。我们撤出蔡部时共计108人，人们开玩笑：“我们是新时代的一百〇八将。”

我们沿着台潍公路南下，那时山东党的力量很薄弱。在临沂，有个崔价同志是党员，那时他在国民党专员张里元那里做统战工作。我们队伍留下了一个张岗同志在那里，后来联系上了营南十字路的谢辉同志，搞起了一支队伍。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看来一切事情除了主观指导的正确外，一定的客观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一直走到徐州才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在长达七百里的行军途中，中间有晴和的日子，也有大雪纷飞的时候。对于这一支小小的队伍，无疑是小小的长征。我和一位诸城青年陈先同志提前出发。那时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是我们当时在路旁的雪地上书写行动的指针。

在行军中同志们热情洋溢，歌声阵阵。当时，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的领导人伍志钢同志为大家做了一首歌，歌中唱道：

我们的队伍多么广大强壮，他有优秀的工农和学生。

我们共有百零八个同伴，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我们欢笑踏起一串歌声，歌声惊醒天上的星星。

我们的心胸好象蓝天的彩云，充满抗战救亡的热情。

（待续）

闽西义勇军长汀挺进队政工宣传队

邓剑雄

董晋

1949年5月闽西起义了，首先是闽西的上杭，武平，永定三个县联合行动，接着是龙岩、连城、长汀各县。除盘踞在长汀县城的卢新铭尚存观望外，汀南一些地方都先后响应起义。

领导闽西起义的主要人物是傅柏翠和国民党第七（龙岩）行署专员李汉冲、练惕生。

先是，李汉冲在1948年秋末受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李良荣的任命，出任福建省第七（龙岩）行政公署督察专员兼“剿匪”指挥官。

李汉冲到任后就和上杭县蛟洋的傅柏翠取得了联系。他们一致认定蒋政权必败，共产党必胜。要下决心领导闽西起义。

1949年1月，李汉冲借口要去广州探亲，前往香港，与我党华南分局联系，请示起义方针。1949年4月上旬，李汉冲派吴德贤（当时任伪专署视察，长汀人）为代表前往广东大埔百侯，向我党闽粤赣边区党委请示闽西起义事宜。当时区党委由范英杰、吴潮芳、赖志雄接见，向吴德贤代表指出：“要认清形势，消除顾虑，早日起义，早立功，立大功，就有光明前途。”李汉冲在得到我边区党委指示后，便着手部署起义。他制造借口，对国民党前方停运军粮，停征兵役，又暗中指示龙岩、上杭、永定、武平各县政府释放政治犯，

（其中包括押在龙岩监狱的魏金水同志的眷属）并密嘱所属部队避免和我党游击队摩擦、冲突。李汉冲到连城视察时借机枪决省参议员恶坝罗倍和……等，凡此种异常举动已引起省政府对李汉冲的怀疑和不满。当时闽西各县布满军统中统特务爪牙，到处受到监视，稍不小心就会影响起义。1949年4月中旬，南京国防部电令撤消李汉冲在闽西的所兼各职。省府也准备派永定人翁赞平接任专员，同时驻龙岩的新兵训练司令王敬致还打算扣留李汉冲。情况危急，后经省府民政厅厅长袁国钦（上杭县白沙人）从中斡旋，推荐练惕生（武平县人）来接任第七行署专员。

1949年5月1日，在上杭县郭车傅柏翠的家中召开闽西起义的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傅柏翠、李汉冲、练惕生、练平、赖作梁、陈天祥、张友民、丘师彦、温梓祥、吴德贤、修焕璜等十一人。保安第四团团团长李玉也写来一封信表示服从会议的一切决定。这次会议传达了我闽粤赣边区党委对闽西起义的指导方针；并通过了有关举行起义的各项决定。

1949年5月23日，傅柏翠、李汉冲、练惕生在上杭县发出通电：脱离国民党统

治，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宣告闽西起义。起义部队称“闽西义勇军”。组成“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傅柏翠任主任，李汉冲、练惕生二人为副主任，练平为秘书长。成立闽西义勇军司令部。练惕生兼司令员，林志光为副司令员，赖作梁为参谋长，李汉铮为参谋主任。各县成立县行动委员会，称分会，设主任委员1人及委员若干人，各乡成立乡行动委员会支会，设主任、委员若干人，以取代国民党县、乡政权。

闽西起义部队在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员刘永生、区党委书记魏金水、边纵参谋主任王汉杰、闽西地委范元辉、罗炳钦等同志的指示引导下，于1949年6月组成第一挺进队（长汀挺进队），第二挺进队（连城挺进队）分别向长汀、连城挺进阻击流窜入闽西的国民党刘汝明兵团和胡璉兵团残部，用实际行动来向党向人民表达立功赎罪的决心。

1949年5月闽西起义时，我是上杭中学应届毕业生，担任毕业班的班长。1948年和1949年期间，我在校主编北峰（上山打游击）凯风（解放好消息）等壁刊，我也担任过白沙蛟洋联合同学同乡会主席。

闽西宣布起义后，学校进步力量校长谢春安（民盟，同安人）应闽西义勇军司令部的要求派出我和傅广安等进步学生参加政工宣传队工作。

我们在政工处一夜之间写成数百张标语。第二天天蒙蒙亮就从上杭城东门开始贴标语，一直贴到西门城墙，到天大亮，已是满城标语。接着，我们参加了政工训练班学习，边纵李白克（副团长）等同志来给我们上课。

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第一挺进队（长汀挺进队），从上杭西门出城开拔，向长汀进军。当时组成以我为队长的挺进队政工宣传队，有黄小冬，林斌、陈鸿书、涂灿琛、涂绍九、李式雄、吴绍鹏、谢启华、张益田、涂华章、吴绍南、等二十余人，随军出发，配合起义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宣传解放工作。

闽西义勇军长汀挺进队司令员林志光，参谋长赖作梁，特派员吴德贤，挺进队军事力量以基干团（原伪保安第四团起义后改编而成）为主导力量，兵力约一千余人。（辖三个营十一个连，包括一个机枪连，一个特务连），在进军长汀中有武平支队（钟勇的起义部队，后叛变），长汀独二团（曹启明起义部队），长汀独三团（黄慕贤的起义部队），长汀独九团（李绂唐的起义部队）等配合行动。

在长汀打游击的我边纵独七团钟德标、游荣长、范云龙部队同时出击，打击敌人。

当我们挺进队抵达长汀县宣成地区畚心村时，兵分两路：一路由涂坊、南山、河田进击；一路由宣成、水口、濯田、四都、策武进击，二路兵力向长汀县城卢新铭部组成钳形攻势。

由于长汀挺进队在进军途中，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旗开得胜，未一个月相继解放了汀南各乡村。

我们政工宣传队担负着双重工作任务，一方面要经常不断的向起义部队进行纪律教育，要求每个起义官兵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部队指战员明确只有严格执行纪律，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的部队才能打胜仗，并且可以早立功，立大功。

另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政工宣传队要配合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利用纸张标语和刷墙头标

语，积极进行政治宣传，“打到长汀去，迎接南下大军”，“闽西人不打闽西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也用过“打倒土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等的标语口号。我们标语下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第一挺进队”。为了军事上的要求，我们标语有时下署义勇军基干一团或基干二团或三团。

我们政工宣传队随军行动，每到一个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解放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宣传。六月中旬，部队进驻长汀水口村时，我听群众讲第二天是濯田圩日，我们就准备好在第二天跟随赴圩群众来到濯田。在集市街头开展解放宣传活动。当天下午又在濯田小学召开濯田乡政人员、保甲长的会议。向他们宣传起义政策，讲解共产党“既往不究”，“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动员他们参加起义行列，就有光明前途……。

六月下旬，我们随挺进队第二营三百多官兵一起来到四都，开展宣传活动。

6月26日挺进队司令部要我和林斌（宣传队员）二人去南埕动员伪乡长曹汉兴起义。我二人带了介绍信从四都来到南埕村找曹汉兴，但由于曹属卢新铭骨干，不愿参加起义，对我们避而不见，因此挺进队第二营决定于27日进驻南埕村。当天下午挺进队第二营三百多官兵到达南埕时，曹汉兴玩弄坚壁清野的花招，我们进村后发现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粮食，最后部队去搜山，把群众称为曹汉兴的侄子曹××“请”回来，由他到山上搬出稻谷数百斤，我们起义战士只得亲自磨谷舂米，曹××还抬来了二头菜猪表示慰劳。当天晚餐，我们是糙米饭配猪肉吃饱肚子的。第二天经由炼坑、东陂岗、陂溪，一路走长岭寨来到梁屋头，河龙头，投入到“6·28”的长汀战役。

闽西起义后，一贯反共的闽西巨顽卢新铭盘踞长汀县城，坚持与人民为敌，被伪福建省任命为伪第七专署专员之职。他将伪专署设在长汀。在闽西义勇军第一挺进队进军长汀，先后解放了汀南各乡村后，卢新铭仍负隅顽抗。卢匪不顾闽西人民的死活，引狼入室，暗中到江西瑞金勾结蒋帮嫡系胡璉兵团残部十八军高魁元部（番号黎川部队）入闽，镇压起义部队，残害闽西人民。当我起义部队对长汀城形成半月形包围时，6月27日我部侦察人员从汀城回来会报，发现卢新铭匪部已撤退去江西黄竹岭，城内空虚等云云。其实是卢匪和胡璉匪部勾结后采取诱我深入的阴谋，而我进汀部队指挥员立功赎罪心切，竟指挥部队于6月28日上午乘胜突入长汀县城。

这时城里到处埋伏着卢匪和胡匪的部队，我政工宣传队员亦不知虚实，随军入城后，即在街头开展宣传活动。政工队员谢启华（上杭安乡人）在水东街头向大街过往人群发表演讲，宣传我党的对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这时谢启华身边已布满了卢匪便衣特务。政工队员陈鸿书入城后（长汀城南门人）得家属暗中示意，摆脱了便衣特务的监视，得以走脱。上午十时战斗打响了。进入汀城的我军部队全部遭受设伏在城内的敌人的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我方进到长汀机场边的第三营第九连90多名战士在连长梁昭带领下正在北首亭方向抢登北山制高点，殊不知敌人胡璉匪部早已埋伏于北山之颠，当我军爬到半山腰时，敌人从北山战壕以轻重机枪对我军疯狂扫射，连长梁昭当场阵亡。许多战士牺牲在北山半山腰，九连战士只个别从老墓埕段走倒角哩迳过汀江河，从黄屋楼下方向走脱外，绝大部分被敌人杀死，此役由于中敌埋伏死伤甚众，损失惨重。在水东街头宣传的政工宣传队员谢启华在枪响后即落入卢新铭便衣特务魔掌。敌人严刑拷打他，要他投降。他痛骂敌人“无耻”，竟被残

酷地钉在柱上，抬到水东桥头示众。敌酋还惨无人道的命令过往敌军，个个都要投一刺刀到谢启华身上，谢启华同志壮烈地牺牲在敌人乱刀之下，他的鲜血染红了水东街头。另一位在桥下坝被掳去的政工队员吴绍鹏在遭受敌人特务的百般毒打后，在南寨坝被活埋了。

在战斗中，我与政工队林斌，黄小冬（即黄培谔）等人和撤出战斗的挺进部队第二营三百多人，从李田向策武方向迅速撤退。当晚，部队在林田湾住一宿。第二天（6月29日）部队继续向高田方向行动，准备退往濯田，但在途径洋田村时得群众报告，当天濯田已被黎川部队六百多匪军占据。情势紧张，敌人已在向我军迂回包抄。为此部队急速转移，向四都、红山方向的丛山峻岭撤走。其间，部队在经过上坪、中坪、下坪时少数起义战士竟违犯纪律，到群众家中去抢饭吃。此时，我们政工人员已制止不住，这也是起义部队在未彻底改造前，在打败仗的情况下暴露它的本质。

部队继续快速撤向汀西边陲地区。6月30日到达了苦竹山和长汀起义部队曹启明部相遇，这时正是农历的五月天气，时晴时雨。身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苦竹山就是湿着身子熬过夜的。七月一日，我们开始进入武北地区，当天部队驻扎在湘坑湖。这里是解放后人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的家乡。当地群众对待起义部队友善。刘司令的一侄儿刘维熊是我的同学，我得到了他的热情款待。七月二日由湘坑湖撤到桃澜。适逢大雨滂沱。桃澜河水暴涨。而渡船已被当地反动分子拆毁。部队为了抢渡桃澜河，三百多官兵全部卸下绑腿，扭成大股索绳，由能泅水的战士把绳索引过河去，系在河岸二边树上，这样三百多人枪并马匹全部攀援绳索，安全过渡。

部队经过周家地、余家地（长汀宣成边陲地区）后到达上杭县境内的官庄，和黎川部队匪军正面遭遇，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敌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用重炮轰击我军阵地，我军抵御不住，继续撤退，到达武平悦洋，（住一夜）敌军尾随跟踪而至，又发生战斗。这时我部已溃不成军。我们被冲散了，政工队队员林斌、黄小冬和我一起撤。三个人到了汀江边的箭头渡，为了尽快地摆脱敌人的追踪，我们三人凑足了船资，租了一只小船，于当天（7月3日）傍晚直达上杭县城东门滩头。

上了岸，走进上杭县城，感到街上已冷冷清清。闽西义勇军司令部、闽西南联合司令部（边纵机关）等机关全部已撤离上杭城。林斌和黄小冬都是上杭城里人，可以回家去了，而我无机关可投，无家可归，只得住进岗背街一家祠堂里（原为兵营），睡在地板上过了一夜。这时，我感到局势确实紧张，应该作速离开上杭城。于是于次日绝早起来，马上去访我的同学郭冰清，告诉她敌人将很快进入上杭县城，要她很好隐蔽起来，并约定了今后联系信号，我还到了林斌家中，要他速离县城。后来知道，林斌不听劝告，没有撤离上杭县城，敌人于当天（1949年7月4日）进入上杭县城，他被敌人搜捕而去。在敌人驻上杭城期间，每天被敌兵押着打扫大街，受尽折磨，敌人败退撤离上杭县城时，被枪杀了。

那天，我化装成挑夫，迅速从上杭东门出城，抢渡水西渡，当行至石灰岭时，据进城卖本炭的炭农折回来讲，水西渡已被敌人先头部队占领，已经戒严，无法再摆渡了。我于当天步行一百华里回到家里。敌人占据了上杭县城后，匪十八军军长高魁元任粤闽赣边区总指挥，分派其部属为各县县长。一时在闽西复辟了反动派的统治。敌人还派出快速部队到上杭蛟洋和武平岩前，烧毁傅柏翠和练惕生的房屋。出了布告缉拿和重金悬赏捕捉（活捉赏银洋

（下转十七页）

南昌起义军入汀与长汀地方党的创建

康模生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一声枪响，宣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新纪元！起义胜利告捷之后，根据党“迅速先取东江，次取广州”的决定，起义军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下，自南昌出发，拟经临川、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寻邬、直入东江。八月二十五日，起义军在瑞金壬田击溃敌右路总指挥钱大钧前来堵截的两个团。八月三十日，起义军分两路攻取会昌，歼灭钱大钧部六千人，剩下三千人向南逃窜至梅县，企图与中路敌总指挥黄绍竑部重施前后堵截故技。起义军审时度势，认为虽然已经赢得瑞、会两仗的胜利，但是如果不随机应变，仍按原计划由寻邬入东江，势必对自己不利，且有一大批伤员和缴获的辎重也难于处置。因此起义军当机立断，于八月三十一日决定进军路线不经寻邬，改由长汀（当时称汀州）、上杭入东江。

九月二日，贺龙同志指挥的二十军先头部队从瑞金向长汀挺进。九月六日，进入长汀城。叶挺同志指挥的第十一军，九月五日由会昌出发，九月九日，也到达汀城。

起义军入汀后，革命委员会驻大衙（今县招待所），二十军驻镇龙宫前段屋（今中华织布厂），十一军驻“龙山书院”（今福建省苏旧址），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驻小桥子头卢屋（今“辛耕别墅”），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驻白马庙前中街工艺传习所。

起义军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汀城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到处散发“没收大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传单，张贴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告示，在二十军军部驻地刷写“革命者来”（至今还保留着）等墙头标语。派出政工人员上街讲演，他们手执小红旗，站在小板凳上，号召广大民众参加革命，鼓励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团结起来抗争“不交租项与田主”。在横岗岭师范学校礼堂，起义军举行了政治报告会，到会三四百人，郭沫若、恽代英同志在大会上作了报告。郭沫若同志作报告时第一句话就说：“三百年前，我也是汀州人。”（郭沫若祖籍宁化、隶属汀州）他亲切和蔼的话语，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恽代英穿一身兰布制服，戴一副近视眼镜。脖子上系一条红领巾，说起话来，精神抖擞，声音宏亮，充满激情，加上有力的手势，听众们的情绪都不由自主的被深深打动。政治报告会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革命影响。

此外，起义军革命委员会在汀城开过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详细讨论了关于取东江的计划。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另一种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

州。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后说，遂照后说决定。第二次会议是讨论筹款问题。原来对筹款也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进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第二种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应该是征发、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等。谭平山同志等主张前一种意见。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主张后一种意见。可是到了长汀，因为长汀商会答应三天内筹款六万元，所以谭平山同志还是照他的老办法筹款，放弃了惩办土豪劣绅的政策，结果上了大当。长汀商会袒护大商劣绅，有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却把负担摊派给一般工农小商人身上，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店都派十元八元。因此，筹款三天仅得二万余元，还闹得满城风雨。所以革命委员会又讨论一次，会上，大家都批评这种不正确的政策，遂又取消旧的政策和方法，采用打土豪罚款的政策，在汀城捉了土豪劣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已出的派款。

长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对起义军的到来无比兴奋，积极响应和协助起义军在汀的革命活动。王仰颜、段奋夫、罗化成、黄亚光等同志主动与起义军政治保卫处联系，提供了全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详细情况，并化装成起义军士兵，带领保卫处捉拿土豪劣绅，进行打土豪筹军饷。拘捕了反动政府①防务局长段燮文，警察局长丘秀章，商会长姜济民、劣绅赖朴生等人，镇压了段、丘、姜、赖四个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由于起义军采用了新的筹款政策和方法，仅两天时间，就筹款四万余元，连同先筹得的二万余元，五天时间，共筹得六万余元。

汀州福音医院在院长傅连璋同志带领下，以极大热情主动联合汀州所有的医务人员，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临时“合组医院”，并动员女子师范和中学的教员和学生来协助护理，因而三百多名起义军伤病员，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当时连傅连璋同志在内只有三个医生，却要给三百多名伤员动手术，还有其他疾病治疗，他们就日以继夜抢救伤病员，每天都要紧张工作十多个小时。协助护理伤病员的教员和学生，也连续几夜通宵达旦守候在伤员身旁。在他们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许多伤病员得救恢复了健康。如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是患急性肠胃炎，又吐又泻，烧得很厉害，昏迷不知人事。陈赓营长在腿两处中弹，膝盖筋被打断，腕骨又骨折，伤势很重，傅连璋同志采取“保守疗法”，终于把陈赓同志的一条伤腿保存了下来，避免了截肢。徐特立同志的病体，也迅速得到好转。起义军在汀时间不长，许多伤病员身体好转后，随军南下去。暂时不能走的，傅连璋同志就让他们留在福音医院继续治疗，并以教会名誉保护他们，免遭敌人迫害。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起义军伤病员终于安全转移。

领导人吴玉章、张曙时、李立三、彭泽民等同志分别接见长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向他们了解和指示工作。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吴玉章在汀会见了北伐时在他部下工作过的秘书干事毛钟鸣同志。毛因蒋介石“四·一二”事变，被迫从武汉回长汀“毛铭新印刷所”从事印刷工作。见面后，吴玉章同志委任毛钟鸣同志为秘书厅总务科长，协助筹款、后勤供应工作，并把在会昌、瑞金缴获的大批枪枝弹药用木船运往上杭。毛钟鸣同志接受任务后，积极组织了四百多名船工和一百多条木船，运送伤员和武器弹药到上杭，再由上杭运往潮汕。

吴玉章、彭泽民、许苏魂等同志还前往“毛铭新印刷所”参观和了解情况，亲切地与工